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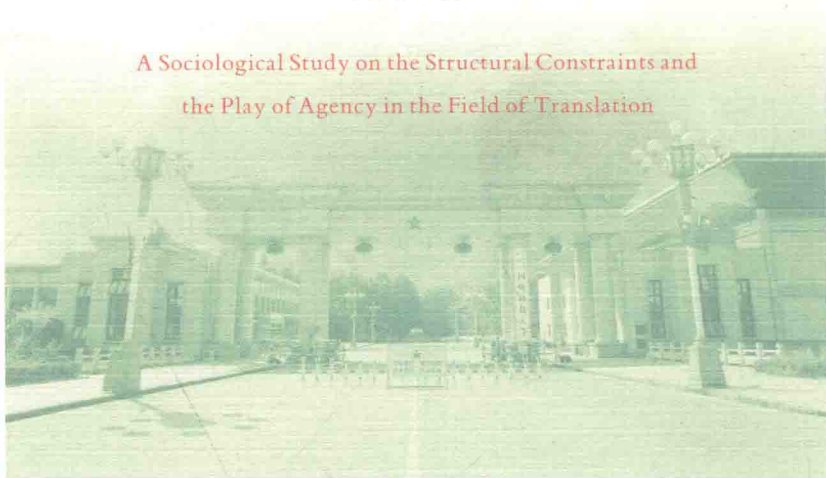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纵横博士文库

社会学视域中的 翻译场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发挥

杨超 著

A Sociological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the Play of Agenc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纵横博士文库

社会学视域中的 翻译场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发挥

杨超 著

A Sociological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the Play of Agenc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视域中的翻译场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发挥/
杨超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7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纵横博士文库)

ISBN 978-7-214-21095-1

I. ①社… II. ①杨…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000 号

书 名 社会学视域中的翻译场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发挥

著 者	杨 超
责 任 编 辑	史雪莲
装 帧 设 计	刘亭亭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095-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纵横”博士文库正式出版了,这是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教育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学院研究生教育 30 周年的献礼之作,可喜可贺。

“纵横”系列学术活动是近年来学院研究生教育致力打造的平台,“纵横”讲坛、“纵横”学术沙龙已日渐成熟,影响广泛、成绩显著,成为推动学院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相信本套文库的陆续出版,会进一步推动“纵横”平台内容日益丰富。

“纵横”一词,在汉语里主要有三个意思:

一是横竖互相交错。宋朝王安石《即事》云:“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这里的纵横,是左右与前后,方位和定位之意。

二是奔放驰骋,通行无阻。唐朝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意思是著书立说视野宏大,思想开阔。

三是合纵连横的节缩语,亦作“纵横”。汉朝陆贾《新语·辩惑》云:“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说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国家安全政策。

纵横的三层意思,对于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的意义而言是非常贴切的。而放到国际关系学院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改革与发展之中来认识,寓意则更为深远。

首先,找准定位。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姓军为战、服务部队是纵贯上下、践行使命任务的经线,研究信息化战争下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是横跨中西、突出综合实力的纬线。只有主动适应改革发展,提升自身实力水平,找到学院生存、发展、壮大的路子,方能经纬五洲、纵横四海。

其次,改革创新。习主席在今年5月30日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作为一所军事高等院校,创新是我们著书立说的追求,是我们教书育人的目标,也是我们事业不断进步的源泉。只有进一步加强学术创新、能力创新和体制创新,我们才能在“强军先强校、强军必强校”的时代勇立潮头,纵横驰骋。

最后,勇于实践。作为一所有着65年历史的院校,培养“察风云、谋纵横”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始终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近年来,学院以“永葆本色”为根本、服务部队为宗旨,建立战略智库,推动教学改革,升级教研条件,打造教学团队,积极拓展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此次将学院的优秀博士论文公开出版,也是我们深化教学实践的重要步骤,欢迎业界专家、同行提出宝贵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全军上下面貌一新。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找准定位、改革创新、勇于实践,主动贴合形势任务,积极谋求转型发展,为国际关系学院谱写“纵横”新篇章。

是为序。

院长:王京兆

政治委员:孙湛修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范式视野中的社会学转向	1
第一节 语言学、文化两种范式的差异	3
第二节 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间的继承发展关系	12
第三节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	21
第二章 结构与能动性——翻译场中的基本关系	32
第一节 社会场理论建设的翻译场	33
第二节 社会场中的结构与能动性	44
第三节 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	55
第三章 翻译场中的结构性约束	74
第一节 研究思路:以“公式”为导向,以道德为考量	74
第二节 权力场中的翻译场结构性约束	78
第三节 资本争夺中的翻译场结构性约束	99
第四节 翻译场信念中的结构性约束	135
第四章 翻译场中的能动性发挥	156
第一节 重新表意:能动性发挥的基本原理	157
第二节 自我赋权:机遇与冲突中的高度能动性	174
第三节 译者社会行为道德判断的复杂性	195
结论	203
一 研究小结	203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208

三 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209

参考文献 212

致谢 225

第一章 范式视野中的社会学转向

2012年,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目标》(*Target*)发表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文章《站在十字路口的翻译研究》(Bassnett 2012)。在巴斯奈特看来,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根基已愈来愈稳。然而,与此同时,它却并未成功挑战世界文学、后殖民、文化记忆等学科已经超越的那些正统的观念。她的建议是,处于“十字路口”转折点的翻译研究应向其他人文学科拓展,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巴斯奈特“十字路口”的隐喻,令人联想到著名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理论。(Kuhn 1962)库恩将科学划分为“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与“特别科学(extraordinary science)”两类。“特别科学”又被称作“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在某个特定的学科内,常规科学是较长的时间阶段内的主流,其特点是保守,尊重传统。它以之前的研究典范为模板,在某个主导范式内运作,其研究不以检验、挑战这个范式为目的。然而,这种常态会不时被各种危机打断,有时甚至遭遇革命,继而引发范式转换。这是因为,主导范式已无法应对新的研究课题。翻译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然而,毋庸置疑,这门年轻的学科也经

历了不少特别的,甚至具有一定革命性质的转向。

对于“范式”这个概念,库恩在理论建设的初始并未给出明确、精准的定义。因此,“范式”概念常被从许多角度解读,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即便库恩本人在理论后期反对将范式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其理论能否完整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学界仍存有争议,正、反两种观点都有许多拥护者。对此,笔者赞同支持一方的观点。^① 库恩“范式”概念虽然有模糊不清的成分,但这个概念却明确地指向一个“学术的共同体”。“范式”概念浓缩的就是这个“共同体”产出的具有较高共性、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知识总合。“范式”概念,以及库恩在其理论的“语言转向”之后对“不可通约”概念的重新认识,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翻译理论研究不同派别之间的共性与区别。例如,翻译理论研究从语言学范式到文化范式,再到“社会学转向”,从仅关注语言间转换如何实现完美的对等,到关注翻译实践发生的社会语境,这其中的改变未必是自然科学式的、彻头彻尾的革命。也许把翻译研究中的“范式”理解为认识翻译问题的不同“视角”更为妥当,更不容易引起争议。但是,抛开“范式”较难界定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不论是“范式”“转向”,亦或是“视角”,都意味着研究路径上的不同取向。因此,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不可通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对翻译的社会学研究的来龙去脉获得更为深刻的把握。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并非凭空而来,要想搞清楚它的渊源,较为理想的方式就是通过比较与之不同、相似的研究范式。总之,笔者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目的在于避免把对翻译的社会学研究的引介变成简单的理论堆砌。使用范式理论,在比较的、宏观的思路中引介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容易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拎出翻译理论演变的脉络。

① 可参考《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崔伟奇,史阿娜 2011)。

第一节 语言学、文化两种范式的差异

一、不可通约:不同的“词典”

“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原本是个数学概念。库恩借用这个概念,指同一学科内不同范式的支持者对研究的内容、定义、标准等存在认识上的矛盾。某一种学问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相互竞争的范式对此描述不尽相同。例如,运动理论要解决的是引力产生的原因的问题,还是引力是否存在的问题。牛顿力学之所以曾被拒于科学大门之外,就是因其与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不同,其解决的是后一个问题。牛顿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后,前一个问题便被剔除。然而,这个问题却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尝试解决的。当然,由于新的范式源于旧的范式,因此新范式必然借用了许多旧范式内的术语、概念、研究方法等。然而,在新范式中,从旧范式借用来的词汇等元素之间却产生了新的关系。例如,当时有人认为哥白尼疯了,竟然认为地球是可以转动的。在这些人的概念中,“地球”定义的一部分就是“不可转动”。因此,哥白尼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让地球转动,更在于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物理学与天文学问题,而这种方式改变了“地球”“运动”等基本概念的定义。没有这些概念上的嬗变在先,地球可以转动的想法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归根结底在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范式内的学者在认识同一个客观世界时使用的视角是不同的。虽然他们观察的是同一个世界,然而在某些领域,他们看到的现象并不相同,他们看到的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Kuhn 1962:147-150)笔者认为,这个观点,用来审视翻译理论研究的不同的研究倾向,同样也是十分有益的。

库恩的理论后来受到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的影响。他借用翻译中的“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说明理论间的不可通约。为了说明理论间的不可通约并非绝对且不可逆的,20世纪80年代,库恩划分了两种性

质不同的翻译过程：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译者使用目标语中的词语系统地取代源语，在这个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都没有任何改变；另一种是解释性翻译(interpretation 或 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涉及语言之间的妥协，要么在一种语言中增加新的概念，要么对原有概念的细节加以改动。(Kuhn 1982:671-673)例如，在翻译某种完全陌生的部族语言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必须先学习这个部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习惯，并将这些知识吸收到目标语中，然后才能进行翻译。可见，两种理论的不可通约、不可译，仅在第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过程中才会出现。

两种翻译概念的划分，体现了库恩晚年思想经历的“语言转向”。他开始借由词汇系统(lexicon)，从语言层面解释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所谓“词汇系统”，指的是语言共同体使用的一系列用来描述世界的语汇。词汇系统与人们生存的世界或掌握的概念相对应，是人们生存的现象世界的基础。词汇系统的内部具有结构性，各个词汇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定义。从本质上讲，不同的词汇系统反映着人们对世界不同的分类方式。当理论革命出现时，同时也是现有的词汇系统无法解释、说明新的概念，新的发现的时候。当人们对世界的根本分类发生变化之后，旧的范式中原有的那些概念的定义、外延也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从词汇系统变化的角度来看，“先前不成问题的科学语言遭到破坏和扭曲”构成了“科学变革的试金石”。(Kuhn 1981:32)“lexicon”这个英文单词在汉语里有“词典”的意思。借用这个意思打个比方，身处不同范式的科学家，参照使用的词典是不同的，也难怪不阅读对方的词典，不学习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那些思想。库恩经常使用的天文学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托勒密认为行星(planet)围绕着地球转；哥白尼认为行星围绕着太阳转。他们的理论大相径庭，反映到语言结构的层面，是因为在他们的“词典”里，“行星”的基本定义、外延便是不同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讲究客观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的区别。它认为科学共同体同时也是语言共

同体,强调正是以词汇系统为核心的语言标记了不同科学共同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不同视角,阐释了不同范式间不可通约、不可译的深层原因。

二、不同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本体

国内较早关注翻译研究范式的有吕俊(2000:42-45)、吴义诚(2001:55-60)、廖七一(2001:14-18)等学者。21世纪之初,著名学者吕俊为翻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理性做了辩护。他批评了张经浩的观点,即“译界现在艺术派与科学派各不相让理所当然,对翻译性质的认识不可能两派都正确,或两派会互相靠拢,来个折中。如果将来出现统一,恐怕只会是一派放弃自身的观点并接受对方的观点”(吕俊 2000:42)。针对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吕俊指出,“如果范式间有不可通约性,一旦旧的范式为新的范式所取代,旧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也都将与旧的信念一起被抛弃,那么科学的进化与连续性又如何体现呢?”(同上:43)笔者赞同吕俊的观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时,不能死搬硬套、以偏概全。尤其是翻译研究中的各个流派,它们之间虽然有不小的区别,但同时又存在共性,有的还存在较高程度的继承关系。它们的发展往往并没有一方压倒另一方、取代另一方的趋势,而是彼此共存共生,从不同维度考察着翻译问题。它们的研究视角具有不可通约的成分,但是它们作为一种研究模式或范式,并非如自然科学一样,以新的范式淘汰旧的范式。此外,“不可通约”源于几何中的一个概念,即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无法比较、公度,因为缺乏径直比较二者的度量单位。可见,“不可通约”这个概念本身强调的更多的是难以比较,而不是强调孰优孰劣。笔者赞同吕俊的观点,也认为在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范式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但这并不影响某个知识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范式完全淘汰另一个范式,在自然科学的漫长发展史中也只是少数,带来的是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种一方淘汰另一方的情况相对更少。在社会科学中,绝对不可译仅在学术界的

语言共同体根本不尝试学习对方的语言时才会发生。此外,由库恩引入的“范式”概念,其定义本身就是相对灵活的。我们既可以把某一社会学科内矛盾尖锐的学派称作范式,也可以把彼此联系较为紧密,但观点、研究视角略微不同的学派称作范式。总之,即便不同范式间真的水火不容,它们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依然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与翻译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前述吕俊的观点,是在翻译研究地位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意在打消学界不必要的顾虑,共迎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世纪之交后至今,围绕翻译研究的范式,国内多位学者持续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学者,要么着重关注某一个翻译范式,要么关注其他学科理论对翻译范式形成、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彭甄(2004:102-105)梳理了翻译研究的几个主要范式(学派),如“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多元体系学派”“解构主义学派”等,并指出“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的文化研究是方向上的主要潮流和趋势。在作者^①看来,早期翻译研究以应用为导向,致力于确立翻译的具体规范、原则等,是规定性的。翻译的文化研究则是描述性的,“将翻译及译语文本置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互动的文化语境中,将目光投向翻译这一特殊言语行为的表现及事实”(同上:104)。作者还指出了翻译的文化研究的缺陷,即“将翻译活动抽象化为纯粹的文化元素引进,脱离翻译行为及其结果去考察超语言的文化元素的互动关系”(同上:105)。彭甄的研究肯定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将翻译、译本放在互动的两个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具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但同时强调翻译的文化研究不能做泛泛之论,成为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佐证。作者强调翻译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结构研究上,即便在翻译的文化研究中也应注意语言学范式并未深

① 正文中“作者”指代前述引文的作者;“笔者”指代本书作者。

刻探讨的翻译的性质、过程等结构性的元素,始终将翻译的研究立足于语言,而不只是文化。笔者认为,语言与文化是水乳交融的,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语言自始至终都是属于语言共同体的交际工具,因此很难说立足于文化的翻译研究就脱离了语言这个基本层面。从彭甄的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哲学、历史等学科出现的“语言转向”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是两条路,还是会重合、交汇成一条路?换句话说,彭甄担心的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若是脱离了那些结构性的、语言层面的研究,会不会变成其他学科的一个分支?作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学界普遍存在的两种焦虑对象: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并非依赖于它对其他学科的排斥。只要是探讨翻译问题,可以把视野放更广一些,多吸取其他学科所有可以利用的精华成分。比如,许多医学专业的学术期刊都以开放的态度发表了大量涉及中、西医翻译的学术成果。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科学(中医临床基础)博士学位论文甚至也包括《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奚飞飞 2012)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多文本中〈伤寒论〉英译探讨》(杨乐 2014)。这些论文立足于翻译,研究中医临床问题。医学专业的学者跨界翻译专业,并不担忧损伤中医学科的独立性,翻译专业的学者跨界其他专业,也没有理由担忧翻译学科的独立性受到任何损伤。笔者认为,这种焦虑归根结底在于翻译研究长期不被重视,被认为无理论可谈,且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学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才是新兴学科茁壮成长的必由之路。否则,追求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时反而会成为束缚学科发展的壁垒,成为文学理论中常被拿来做隐喻的那只“缺失的阳具(phallus)”,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纷争。

张广法(2011:36-40)对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的矛盾关系做了颇具价值的专项研究。张广发的基本观点与笔者不谋

而合,笔者在此将其简要总结、评论如下。作者指出目前国内翻译研究存在两大主要流派。语言学流派的代表学者包括张柏然(张柏然,辛红娟 2005),吕俊(吕俊,侯向群 2006),赵彦春(2005)等。他们批评文化学派的研究执着于外围研究,消解了翻译研究的主体。以谢天振(2008)、耿强(2009)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则坚称自己的研究并未脱离翻译研究的本体。在他们看来,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单纯的语言间转换,还包括社会、文化等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张广法整理了两种范式里的中、西方学者对翻译研究核心概念的定义,指出两种范式共同占有许多相同的概念,如“翻译”“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等。然而,由于两种范式认识翻译的视角根本上不同,因此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相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也不尽相同。例如,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用等值的译入语文本材料替换源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20)奈达、纽马克等语言学范式内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也基本相似。反观文化学派,其理解翻译的视角就不相同。例如,勒菲维尔(Lefevere 1992:25)认为,翻译本质上是改写,改写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这样或那样的操控。笔者认为,描述学派的代表学者图里(Gideon Toury),以及谢天振等学者对翻译的定义均相对宽泛。此外,他们的定义中引入了“功能”“社会”“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其视野中的“翻译”是个范畴更加宽泛的概念。语言学范式内的学者更加关注以何种操作技术与规范实现源语、目标语之间的最大化等值。文化范式内的学者更加关注翻译行为自始至终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碰撞,以及这些互动、碰撞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效应。张广法正确地指出,不同范式的学者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与视野中看待同一个翻译现象,得出并不相同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翻译理论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现象本身的变化,而是改变了学者们所研究的世界”,“因此,当面对不同范式的译论时,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种范式的视角和标准来评判另一种范式,认为文化范式译论所研究的并非翻译的本体,或者语言学范式译论所宣称的本体并非

翻译本体的全部内容”(张广法 2011:36)。笔者认为,张广法对“不可通约”这个概念把握得较为深刻,所以对两种范式的矛盾关系阐释得到位、客观。翻译研究的本体只有一个客观世界,翻译研究的现象世界则因范式不同而迥然不同。如果回顾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及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拯救了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使其走出无休止的,探讨世界本源的泥潭。相应的,如果把翻译研究本体的客观世界与现象世界混淆,抛开彼此不可通约的范式去讨论翻译研究的本体,也将徒劳无益,哪一方也无法说服另一方。

厘清了这一点,再看译界关于翻译本体的争论,轮廓就变得更加清晰。2004年,吕俊(2004:53-59)在《外国语》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的文章。作者肯定“文化转向”能开拓译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强调了其中的危险:“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同上:57)作者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离心式的”“外在的”研究,翻译研究应以语言为核心,需要“主要依赖其内在研究,即本体研究”(同上:59)。语言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例如,赵彦春在《翻译归结论》中指出,“近三十年的文化派译学研究虽不乏善可陈,却是一步步走向了歧路”(赵彦春 2005:2)。赵彦春认为,文化学派研究的是翻译中边缘性的东西,比如从历史、文学、政治等角度切入,“与翻译的本位研究恰是南辕北辙的”(同上:4)。作为对语言学派这种观点的回应,谢天振(2008:6-10)在《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一文中做出了回应。他首先考察了西方语言学派内部的发展历程,发现最早从奈达开始,许多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学者在研究中不失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照,比如英国学者哈蒂姆(Basil Hatim)等。一些在学术生涯早期使用语言学研究翻译问题的学者,如梅森(Ian Mason)、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贝克(Mona Baker)等,如今已开始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视角研究翻译问题,文本内的对等关系不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其次,谢天振指出,一些学者混淆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翻译本体代替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在他看来,即便语言间的转换是翻译的本体,翻译研究如果要研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将译者、接受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都纳入翻译研究的本体的范畴之中,因为大家都承认,“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翻译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恰恰依赖于其研究对象的广泛包容。(同上:9)笔者认为,谢天振通过区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两个概念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如张广法直接使用“不可通约”的概念清晰明了,但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提法类似一种让步式的迂回论证。其实,笔者认为,在文化范式的理论框架中,学者们即便直截了当地指出翻译的本体不是文本,而是以译者为核心的诸多因素的集合,也是合情合理的。归根结底,他们使用的“词典”不同,对翻译的定义也不相同。

三、小结

科学范式理论应辩证、谨慎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的流派、范式等往往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一方淘汰另一方,而是既具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别,彼此共存。翻译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是唯一的,现象世界却是多样的,取决于学者们使用的不同视角。科学范式理论中的“不可通约”概念可以用来考察不同范式所使用的不同视角之间的本质差异。笔者介绍、评论了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内的多位学者有关翻译研究本体的探索争鸣,借此想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翻译研究能否长期保持独立的地位,不像过去那样成为语言学、比较文学的一个部分,将来也不沦为某个社会学科的研究子项,这是翻译理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具有正